

1913

●肝胆相照见真情

——记李烛尘与毛泽东的交往

●学运先锋 青年先导 教育元勋

●爱国奋进的肖纪美博士

●一片丹心写人生

●杨正午：土家山寨走来的省长

●从苗家娃子到将军

湘西文
史资料

'97.1

湘西文史资料

总第四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湘西文史资料

总第四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副主编 傅冠群

《湘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发行

湖南省吉首市团结西路8号 电话 8223833

邮政编码:416000

湖南省吉首精美彩印公司印刷

1997年5月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6849

国内统一刊号:CN43—1012/K

定价:7.00元

写在前面的话

历史是人类的活动。历史的发展,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读历史,首先要读人的历史。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期,都有本民族的代表人物。而能够代表民族精神的,总是这个民族德才兼备、大智大勇、爱国爱民、乐于奉献、勤奋向上、建功立业的人。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构成了历史上最精彩的篇章。

为庆祝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四十周年,我们编辑了这期民族干部成长史的专辑。书中的人物,有湘西少数民族中的红军前辈、卫国将士、科技中坚、人民公仆、劳动模范……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奋斗不止,甚多建树。而不论职位高低,贡献大小,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成长,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爱护、培养,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

干部者,国之骨干,民族之栋梁。一批干部的道德水平、政治理想与工作能力,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大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湘西地区,剿匪建政,救民于水火;筹粮支前,助国家之兴革,任务何等繁重。而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所抓的大事之一,即遴选和培养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干部。基层工作锻炼,手把手言传身教,心贴心阶级情深;各类学校培养,学政治,学文化,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升华,而终于有了一代少数民族干部的茁壮成长。喜看今日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民族干部展才干,挑重担,主沉浮,兴盛活跃。本辑所述之人物,即这支队伍的代表;所述之史实,即这段历史的缩影。在湘西自治州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当于人有所教益。

编者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编 者

2A38 / 16

肝胆相照见真情

——记李烛尘与毛泽东的交往

傅冠群〔1〕

学运先锋 青年先导 教育元勋

李树林 雷美芭〔11〕

彭飞在朝鲜

盛星辉〔19〕

风雨长征路

石邦智〔31〕

一个老战士的战斗历程

吴清泉〔34〕

爱国奋进的肖纪美博士

龙兴友〔49〕

一片丹心写人生

彭司勋〔53〕

投身革命五十四年

刘 真〔62〕

求学——成才——尽责

夏家骏〔71〕

导弹腾飞建奇功

何 丽〔77〕

土家族作家孙健忠

张二牧〔87〕

苗族诗人石太瑞

张二牧〔94〕

民乐声声壮武陵

——访苗族作曲家理论家花老虎

傅冠群〔101〕

热心修史谱新篇

——记苗族史学家伍新福

凤 文〔108〕

艰难的跋涉 无私的奉献

彭汉红〔113〕

杨正午：土家山寨走来的省长 夏莉娜 徐仁杰〔122〕

从苗家娃子到将军	
——记某集团军副政委张正钧	杨龙溪[132]
为祖国追求	
——记国防科大副政委吴昌孝	李 微[141]
振兴故里百年计 遥念家乡万里情	
——王双林关心家乡建设二三事	彭 勃[148]
发扬“三大”作风	
与坚持“三同”的工作方法	田荆贵[154]
忆先父黄穆如	黄淑珍[161]
柳暗花明又一村	
——记吉首县苗族县长石元星	胡理明[167]
扶贫十年彭司令	彭育群[178]
三上龚家湾	符光安[185]
尽职尽责多办实事	刘定远[190]
“老师傅”的功夫	吴厚生[197]
自强不息 不断进取	吴 江[203]
公仆情怀	符吉平[208]
丰碑	
穷乡僻壤造福人	田 雁[213]
	吉祖步[220]

肝胆相照见真情

——记李烛尘与毛泽东的交往

傅冠群

毛泽东主席喜欢结交各个方面朋友，这是人所共知的。他有一位相知甚深的党外朋友，就是祖籍湖南省永顺县的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先生。对这一点，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李烛尘(1881~1968)，原名华樛，从本世纪初叶开始，致力于创办中国的民族化学工业，曾任永利碱厂厂长、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他保全民族气节，将工厂内迁入川。解放前，烛尘先生曾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旧政协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轻工部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委、民主建国会副主委、全国政协副主席。

第一次见面，烛尘先生称赞 毛主席是“炉火纯青”的政治家

毛主席与烛尘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之时。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从延安飞抵重庆，亲自参加国共两党谈判。9月17日，毛主席在重庆曾家岩张治中将军的住宅桂园，邀请吴羹梅、刘鸿生、范旭东等人士座谈。座谈会结束，毛主席起身送客，向走在最后的范旭东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

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范先生可否出任一个部的部长？”

范旭东沉思片刻，恳切地说：“毛主席，我不是做官的料子。不过，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人。”

“谁呀？”毛主席极有兴趣地问。

“李烛尘！”范旭东回答道。

毛主席踱回办公室，询问周恩来同志：“我的这位湖南同乡怎么样？”显然，他对李烛尘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毕竟永利、久大两个公司在世界上也是知名度颇高的化工企业了。

“很进步，很有胆量。”周恩来同志笑着说道。“他和我们党早就有了交往。上个月，他还对《大公报》和《新华日报》发表谈话，欢迎主席来重庆哩！”

几天后，毛主席与周恩来、王若飞在中共代表办事处举行重庆工商界团体负责人座谈会，名单中多了一位客人，就是李烛尘先生。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我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阐明了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毛主席很想更多地接触一下这位德高望重的民族工商业家。在离开重庆的前几天，又单独请李烛尘先生共进午餐。

宾主略事寒暄，李烛尘先生就对毛主席坦诚相告：“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确实可信可行。不过，我的政治态度，是不右倾，不左袒，主张‘民有、民治、民享’。”他还告诉毛主席，他正在同黄炎培、胡厥文等人筹组民主建国会，要为争取民主政治、维护产业界生存而斗争。

毛主席笑着说道：“烛尘先生真是快人快语，令人钦佩。这么大的国家，应当允许不同主张、不同观点存在嘛，搞独裁是行不通的。”

李烛尘先生见毛主席胸怀这样宽广，也恨不得将心中所有一吐为快：“要是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希望能采取‘国农民工’的建国之策。战后国力维艰，百废待举，政府可集中人力、物力、财

力，扶持发展中国落后的农业；而工业则不妨交给已有一定力量、一定规模的民族工商业者来兴办。这样，工业、农业不就可以兼顾了吗？”

毛主席禁不住连连称赞：“有道理，有道理！烛尘先生和范旭东先生创办化学工业，对国家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的嘛。”

毛主席接着又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国家独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他风趣地对烛尘先生说：“我们共产党是始终把民族资本家当作朋友的噢！”

宾主连连举杯，尽欢而散。

李烛尘先生的大儿子李文采，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共产党，这时正在重庆，公开身份是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师。他见父亲做客回来，问起父亲对毛主席和蒋介石的看法，李烛尘先生毫不含糊地说：“毛主席是炉火纯青，伟大的政治家，而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狡诈的小人。”

不久，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协商，提名李烛尘先生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旧政协；在党内，则由徐冰、许涤新等同志经常与李烛尘先生保持联系。他从此步入政坛，成了高举爱国、民主旗帜的社会活动家。

毛主席到达西柏坡，立即致信李烛尘。

李烛尘先生为迎接天津解放奔走

1948年年初，李烛尘先生正在天津继续经营永利、久大两家公司。人民解放战争的硝烟越来越浓，炮声越响越近。工厂机器时开时停，生产很不景气。他经常回想起那几年的遭遇，思绪难以平静。

八年抗战，好不容易盼到了最后的胜利，李烛尘先生满脑子所想的，是恢复永利、久大旧日基业，为中华民族的化学工业再展宏

图。可是，他所遇到的，却是劫收大员的巧取豪夺，堂堂政府的设卡刁难。

在天津塘沽，久大、永利产业得故旧照应，较快收回，但国民党地方政府以李烛尘先生“态度左倾”，密令特务暗中煽动工潮，连派去的厂长，也多次被驱赶出来，整顿颇费精力。在青岛，所属永裕盐业公司被国民党政府以敌产名义强行没收，宋子文提出要加入“官股”才能发还，其意实为吞并。在南京，永利铵厂要求前往日本拆运被盗走的硝酸铵设备，政府迟迟不示可否。李烛尘先生两次向蒋介石当面交涉，甚至拍了桌子，也还是拖了一年多，到1947年4月，工厂被劫设备方得以运抵该厂；6月，永裕终于物归原主。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李烛尘先生明显地看出来，“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道路走不通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李烛尘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共产党接管政权指日可待。只是他当年提倡不右倾、不左袒，跟共产党是有距离的，共产党会怎样对待自己呢？

5月底，李烛尘先生收到一封辗转送达的密件。拆开一看，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

在信中，毛主席解释了我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强调对民族工商业，不但要保护，而且要进一步发展。毛主席表示欢迎李烛尘先生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希望他支持人民解放事业。

这是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后立即写的，也是他写给李烛尘先生的最早的一封亲笔信。1992年4月，我拜访了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员会主席沈其震先生，他清楚地讲述了这件往

事。

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的信任、指点，给了李烛尘先生极大鼓舞。这时，党组织又及时委派李定（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记者）、王文化（时任中共天津工委委员兼企业委员会书记）等同志与他取得了联系，还和他商谈迎接天津解放的具体事宜。李烛尘先生非常兴奋，连连表示尽力而为。

他带头反对国民党政府要天津重要工厂企业南迁的命令，使广大工商业者很快稳定下来，粉碎了国民党摧毁天津工商业、给共产党留下一座空城的阴谋。

他多次召集资本家座谈会，有一次还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摆在桌面上，宣传共产党的经济政策。

他还为争取天津和平解放四处奔走。先是通过胡适向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上层人物发电报，要求他们不要在天津打仗；后又亲自对天津市长杜建时、警备司令陈长捷、警察局长李汉元进行劝降。不过此举非但没有成功，且使他的住宅附近还出现便衣盯梢，处境相当危险。

1949年1月15日，天津刚一解放，军管会立即派人将李烛尘先生接去，严加保护。李烛尘指示久大、永利两厂立即复工，以实际行动支援人民军队解放全中国。无疑地，他已决心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余生。

1949年6月15日，李烛尘先生接受毛主席的邀请，作为产业界民主人士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与李烛尘交往日深， 肝胆相照见真情

新中国诞生了，李烛尘在民主建国会、工商联和中央人民政府担任多种领导职务，团结和引导全国工商界认清前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后又出任食品工业部(后改为轻工业部)部长,致力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直至离开人世,始终不遗余力。而毛主席与烛尘先生的交往,无论公情私谊,均非同寻常。

毛主席非常尊重烛尘先生和像他这样的工商界人士。如出兵援助朝鲜、发行建设公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均事先征求工商界和各民主人士的意见。李烛尘先生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表意见,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表示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1950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刚跨过鸭绿江一个月零五天,他就在天津组织工商界四万多人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实为全国之先导。年近七旬、白发斑斑的李老仍高举小红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并时不时领头高呼口号。对李烛尘先生这种杰出的爱国行动,毛主席于12月2日亲自致电表示欢迎。

李烛尘先生最难得的一点,是敢于直抒己见,坦率陈辞。1950年冬,毛主席曾亲临天津烛老家中拜访;后来又多次将烛老接到中南海,听取他对国家工业建设的意见。当时私营工商业普遍存在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税负、资金等问题,烛老都曾书信或当面向毛主席一一反映。有人问他:你不怕人家讲你为资本家讲话呀?他坦然地回答道:“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我应当讲真话嘛。”而烛老的意见,为党中央制定对工商业的政策,确实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烛老的敢说敢提意见,当时是名声在外的,连司机都不免为之担心。他在天津时的司机王树发同志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他送烛老到北京丰泽园毛主席家中开会,很多人士都参加了。会开完后,沈钧儒先生等人一个接一个离开了,他又等了很久,烛老还是没有出来。当时正在开展“三反”“五反”,他生怕是烛老在会上讲错了话,被当场扣留了。正在胡思乱想,陈伯达出来通知他到前门那边去等。他亲眼看到毛主席和李烛尘先生谈笑风生地走

出来,把烛老一直送到门口。

直到1964年元宵节,毛主席请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等10位老人到家中作客,烛老还当面向毛主席提出发展盐的综合利用和采用新技术的建议,耿直坦诚如旧,也一如既往地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

李烛尘先生年长毛主席11岁。毛主席把这位忠厚长者,是既当作朋友,又当作老师的。1950年参观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会,1952年视察黄河,1955年视察西北,毛主席都邀请熟悉这些方面情况的李烛尘先生同行,以便随时请教。1990年,杨尚昆同志谈起过当年视察途中毛主席向烛老学化学的情形。请教者虚心仔细,是真学;解答者热情详尽,是真教,体现了两人不同一般的情谊。

毛主席对烛老非常关心。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毛主席每年都要单独请李烛尘先生吃一次饭。烛老的司机曾好奇地问他:“烛老,毛主席请你吃饭,有些什么好菜呀?”烛老笑着解释:“毛主席生活很简朴,请客吃饭,也就是两个荤菜,其它都是湖南口味的小菜。主要是谈心罗!”从这里不难看出,李烛尘先生非常喜欢毛主席这种亲切随和的接待,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1954年,十四世达赖首次进京,9月14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受到毛主席接见。他献给毛主席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有虎皮、麝香等土特产和佛珠等物。毛主席只对箱子看了一眼,立即吩咐警卫战士:“把这些东西给李烛尘先生送去吧,他用得着!”

那块虎皮,后来烛老用来作褥子,他的孙子李明智在烛老逝世后还在家中看到过。李明智对笔者说过这样一番话:“一看到这块虎皮,我就想起了爷爷,想起了毛主席和爷爷的深厚友情!”是的,这确实是一种很深的友情。建国初期,政务繁忙,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领袖毛主席,竟时刻记着这位党外朋友,谁能不为之感动呢!

毛主席和烛尘先生交谊甚笃的主要原因 还是思想上有共同点

对毛主席和烛尘先生交往的这一件件往事了解得越多,就会越急于寻求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能保持如此之深的友谊?

烛老的长子李文采,现在也是87岁高龄的老人了。去年,笔者请他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文采老人只讲了一句话:“那当然还是思想上有共同点罗!”

文采老人说得对。正是如此。

李烛尘先生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辈子,为创办中国的民族化学工业饱尝艰辛。在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和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他深刻认识了共产党的诚意,多次说过:“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官员,一定能使国家很快富强起来。”“国家拿这么多钱发展工业农业,是我过去从未敢想的事。”他感到是毛主席指引他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光明的道路,毛主席敬重他,他更敬重毛主席。早在1951年,李烛尘在天津市工商界就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还在当年申请将久大、永利公私合营。

在烛老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感到,他和毛主席在思想上有很多共通之处。

毛主席发出“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号召,李烛尘先生认为很有道理。在旧社会,烛老虽是资本家,生活却很俭朴。久大盐厂创办之初,他不住公司为他租来的法租界的花园洋房,却带着家人住在厂区的工房里,而且一住10多年。他曾对建国初担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同志说道:“毛主席讲得对。兴由勤俭败由奢,反对奢侈浪费,关系到新中国能否兴旺发达。”一天,王光英同志在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烛老的办公室,亲眼见到他把旧信封翻过

面来再用。烛老当了部长后，每逢出差，凡可乘火车到达的地方不坐小车，只要秘书一人，从不带警卫员，住房也力求简单，有个卫生间就可满足。再回想一下毛泽东主席衣服补丁擦补丁、白布床单木板床的习惯，这是多么相似啊！

一生脚踏实地办实业，烛老处事极其认真。1953年，中央任命他为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他想，“自己在天津市民建和工商联已有职务，又要兼顾公司事务，一心挂几头，忙不出明堂来，再担任副主席一职，对国家是没有多少贡献的”，就上书毛主席倾诉苦衷，明确表示推辞。毛主席回了一信，委婉地劝告李烛尘先生“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不会觉得太忙了。”烛老把这几行字翻来复去地看了又看，深深领会了毛主席对自己的关切、信任、期望，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

1956年，烛老到北京工作后，兼职更多，从未叫过苦，总是默默地埋头苦干着。不单是挂名，而是一段时间内处理一个或几个主要问题，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给后人留下了一座丰碑。

烛老出任部长后，挑起了全国轻工业建设的担子，毛主席建议他多看看工厂，多调查，以便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轻工业的路子。这正对烛尘先生的胃口。他在旧社会就很注重调查考察，曾深入沿海、华北、四川、西北，从而形成了发展化学工业和国家工业建设的一些独到见解，著述甚丰。听了毛主席的建议，他更把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当作第一要务。像生活必需品，城里人需要什么，农村人需要什么，北方和南方的要求有什么不同，他都了如指掌，逐渐形成了发展轻工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增加国家收入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烛老为中国轻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正由于思想上有这么多相通之处，毛主席和烛老才能以诚相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毛主席也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第一次和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亲自圈定的上天安门的党和国家

领导人名单中,都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烛尘。只是李烛尘先生当时已重病缠身,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他本想请假,但想到自己是民建和工商联的代表,不露露面,对这两个组织的人压力太大,就由两名警卫战士搀扶着,勉强登上天安门城楼站了一站。这以后,他一直在家养病。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李烛尘先生未受到任何冲击,平静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

往事历历,有的如过眼云烟,有的却永垂青史。毛泽东主席与李烛尘先生之间的交往和友情,真正体现了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崇高精神,将永远为后人所传颂。

(原载《名人传记》1993年第10期)

学运先锋 青年先导 教育元勋

李树林 雷美芭

李昌同志原名雷骏随，1914年12月12日出生于永顺县塔卧镇，土家族。他的曾祖父是洞庭湖边安乡县的居民，到塔卧经商开旅店赚钱，购买田产而在本地落户，逐渐成为大地主。传到第三代，即李昌的父亲雷成五，和邻近的龙家寨土家族田家联姻；成为全县的开明士绅，曾任县议长，商会会长，红十字会会长。母亲田扬英生的子女多，李昌是由信佛吃斋的祖母照顾、雇人抚养大的，有时也寄养在农民家中，所以从小他同农民比较亲近。

1928年，为了继续学业，年仅14岁的李昌在父亲和胞兄雷男的支持下，决定外出求学。当时，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雷男在上海工作，李昌从偏僻的家乡经常德、长沙到上海。二哥雷男在杭州安定中学读书，而杭州的社会风气比较好，李昌就进入杭州清波中学读初中。清波中学是由有改革思想的教育家裘曼冲先生创办的小规模私塾型学校（校长常为学生改日记和亲自辅导），以采用道尔顿制著称，其分级编班的标准是按学生的各科成绩高低，同时跨编几个班级。李昌当时语文成绩最好，于是编入语文高级班，数学中级班，英语初级班。该校先在杭州山东会馆开办，接着迁至云居山一所陆军兽医院旧址，在教学和管理上认真深入，而食宿等生活条件却非常艰苦。在这种情况下李昌发奋攻读，学业大有长进，同时也经受艰苦生活的锻炼。

半年后，雷男和大嫂杨淮关心小弟，为便于就近照顾，决定李